

“弱”关系 “强”在哪里：

网络参与下地方政府决策回应模式研究

翁士洪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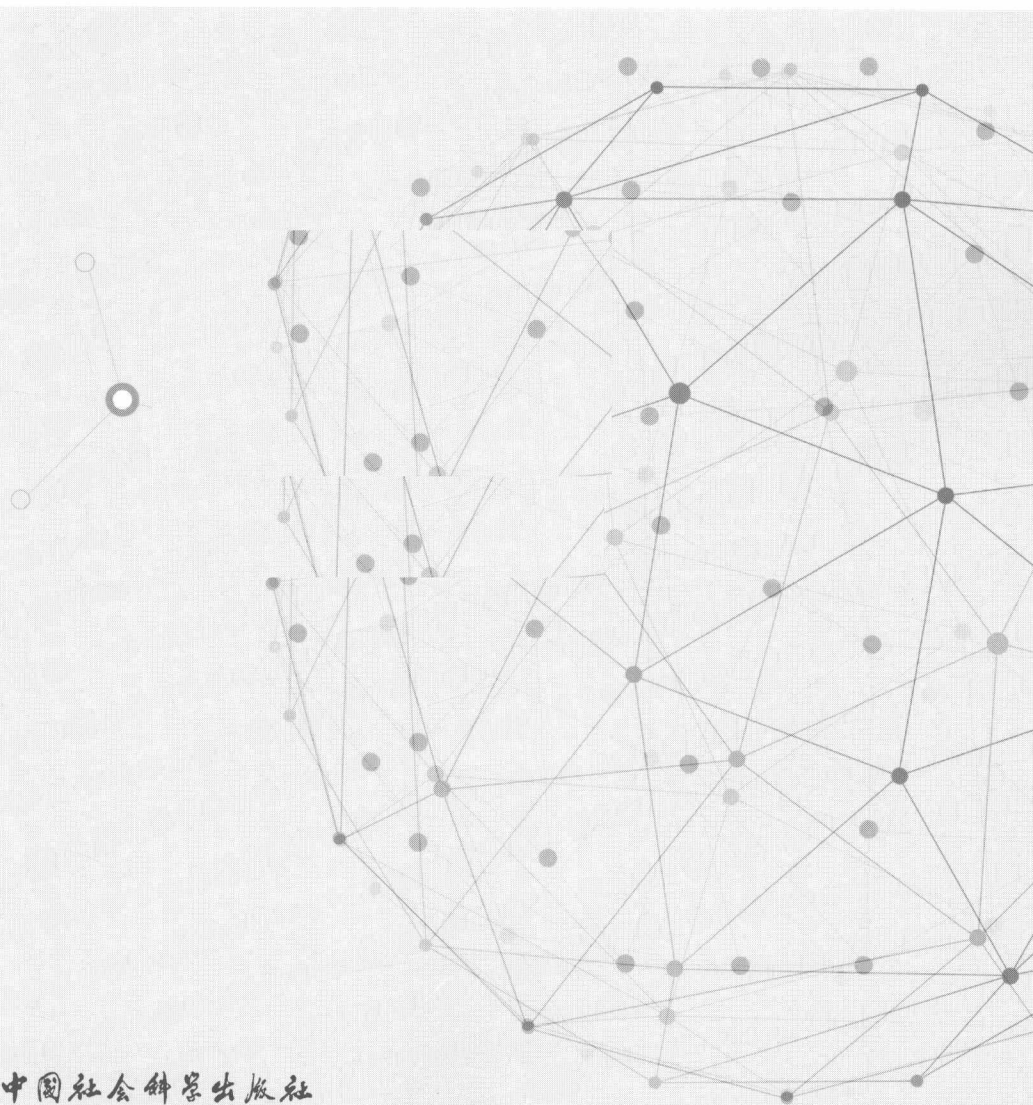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弱”关系 “强”在哪里：

网络参与下地方政府决策回应模式研究

翁士洪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弱”关系“强”在哪里：网络参与下地方政府决策回应模式研究 / 翁士洪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3

ISBN 978-7-5203-1693-4

I. ①弱… II. ①翁… III. ①互互联网-应用-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方针政策-研究-中国 IV. ①D625-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1422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李庆红
责任校对 夏慧萍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6.5
插 页 2
字 数 279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网络参与下地方政府决策回应模式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14CGL042）

序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时代的来临，网络参与这一全新环境将直接改造政府和公民的互动模式，相应的，地方政府决策时的回应行为和策略就变得更加复杂。网络参与是近年来崛起的一种公民参与政治生活，表达政治意愿的方式，它以互联网技术为载体，公民通过网络途径表达自己的诉求来影响或者改变政府公共决策和公共事务，同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政府提升公信力。互联网为公民的社会活动参与提供了一个更加宽阔的虚拟平台，并且表达方式也变得更加灵活。社会热点事件往往能够引起各方面的极大关注，而公民在网络上发表有关事件的言论和看法对于政府了解事态走向和公民意愿具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也能够加强政府和公民之间的互动交流。翁士洪博士作为学界的新锐，敏锐地看到了网络以及网络参与在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并从当前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指出公民网络参与和政府的决策回应离不开技术、社会以及制度三个方面的保障。

第一，作者提出了一个有关中国网络参与下的地方政府决策回应典型模式的理论框架，通过对大量案例中网民与政府行为的实证分析，探讨了中国地方政府决策主要治理模式及其相应的政府回应类型。此外，翁博士还使用了大量网络舆情和政府回应的资料，采取社会网络分析和统计分析考察了网络参与下地方政府决策回应的三个维度：网民参与程度、政府回应程度和网民与政府互动程度，验证了模型，并重点考察了各种模式的特点、网络舆情、主体行为模式、作用机理与回应效果。

翁博士的研究回答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网络时代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如何有效吸纳公众意见、实现决策者与公民的良性互动？作者从理论上界定了网络参与和政府决策回应的完整内涵，从根源上厘清了网络参与下政府决策回应的动力，深入研究了网络参与对政府决策的作用与影响机制。

第二，作者探讨了网络参与下地方政府决策回应的模型建构。作者通过对大量的数据资料进行深入的分析和归纳，提出了理论假设，运用相应的理论及技术方法完整有效地建构了网络参与下政府决策回应的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抽象出在网络参与下地方政府决策回应的各种模式。作者通过定量分析、案例研究等方法，选取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模式验证其信度和效度。根据实证研究，找出了现存问题的症结所在，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第三，文中还探讨了网络参与下地方政府决策回应的模式类别。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抽象出的在网络参与下地方政府决策回应的各种模式（鸵鸟模式、杜鹃模式、蜂王模式、鸳鸯模式等）进行了比较分析，找出了其相互之间的共性特征、个性特点及其作用机理，并以之考察当下中国网络参与下地方政府决策回应的现状及产生根源。

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作者结合对网络参与下地方政府决策回应的经验借鉴，分析了当前中国地方政府决策回应经验存在的主要问题，归纳提炼出网络参与下国内外的地方政府决策回应的典型经验与模式，包括自治型治理模式、共管型治理模式和管制型治理模式等，并分析其启示与借鉴，以此作为本研究进行创新性设计的现实依据。在此基础上，作者探讨并提出了网络参与下地方政府决策回应的对策。指出了在网络参与背景下，推进符合我国客观发展现实，提升地方政府决策有效性和治理效能的对策建议，即分别从政府与公众两个主体层面提出完善网络立法、规范网络参与秩序、增强与政府间的互信与互动的路径等。

根据多年来对于网络参与的研究，笔者认为，这部著作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前沿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最大的亮点在于从网络参与背景下政府决策回应过程和机制的视角来切入中国社会转型中政府决策研究，这是个较新的视角，目前学界的研究还不是很系统深入。

其次，该书提出了网络参政、网络民主的理念，尤其以有关政府决策时的网民参与程度和政府回应程度两个维度，根据网民与政府这两个主体在政府决策中的互动程度，建构起网络参与下的政府决策回应模式的理论模型：参与—回应模型。这个理念较新。

最后，书中的观点创新表现在，通过研究提出了网络时代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中有效吸纳公众意见、实现决策者与公民的良性互动的路径选

择；分析了我国公共决策中地方层面如何应对网络参与压力，地方政府角色由管理者、控制者向谈判、协调、引导与合作者的角色转变，推进网络依法规范有序运行的理论思考等。

书中尤其具有新意的是，作者提出了“以网络民意先发、政府被动回应、网民与政府互动不均衡为主要特征的杜鹃模式”是中国地方政府决策回应的主要模式。作者指出：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政府对公众意见的接受是政府回应的关键环节。政府能够接受公众意见，且愿意将公众的偏好整合进政治决策之中，是政府回应的先决条件。但是，在网络参与的环境中，政府决策回应还受到时空因素、议题归属和诉求表达方式的重要影响，对此，地方政府在制定与执行政策过程中对公民诉求往往采取选择性回应策略。因此，中国各地政府决策的回应模式主要是杜鹃模式，便容易理解了。

由此可见，“杜鹃模式”有助于分析网络参与下的中国地方政府决策回应，深化了现有的中国政府治理研究和中国地方政府回应行为研究。

那么，在网络参与环境下，如何提升政府回应力，化解网络政治风险，引导规范、有序的网络参与？翁博士的研究又提出了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之对策，这种理想模式称为“鸳鸯模式”，是政府与网民共同主导、政民高度互动的双向互动模式，网民和政府都是主动方，沟通方向是信息在网民与政府之间双向均衡传递。这种理想模式的特点是网民参与程度高，而且政府回应程度也高，网民与政府高度互动，犹如一对鸳鸯，形影不离，相濡以沫。其作用机理体现在，政府和公民双方都认识到，网络参与有利于公民利益诉求的表达、有利于拓展公共决策信息基础、有利于改进公共决策质量，并有利于监督政府权力运行，从而可保证公共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增强公民的政治绩效感，培养公民独立自觉的政治人格。

简言之，翁博士主持的这一课题，切入的视角较为新颖，具有较强的社会应用性，揭示了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与热点问题，提出了诸多具有理论亮点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思考。通过作者的深入研究也有很多新的发现，进行了大量探索性的研究和尝试，难能可贵，是学界青年才俊中非常有代表性的力作。

顾丽梅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2016年8月9日

目 录

导论 弱关系有没有优势	(1)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现状述评	(5)
一 网络参与和地方政府决策回应的条件依据	(5)
二 网络参与和地方政府决策回应的研究基础	(18)
第二节 研究意义	(29)
一 理论意义	(29)
二 现实意义	(30)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30)
一 研究思路	(30)
二 研究内容	(31)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32)
一 研究方法	(32)
二 创新之处	(33)
三 寻找新的研究方向：传统与网络参与下地方政府决策 模式的变化	(34)
第一章 理论基础：网络参与和地方政府决策回应的理论阐释	(36)
第一节 网络参与兴起的动力基础	(36)
一 网络参与兴起的内在动力	(37)
二 网络参与兴起的外在动力	(40)
第二节 网络参与的作用与价值	(44)
一 网络参与的作用	(44)
二 网络参与的价值	(50)
第三节 网络参与的影响机制	(56)

一	网络参与的权力机制	(56)
二	网络参与的信息机制	(58)
三	网络参与的沟通机制	(62)
第二章	模型建构：网络参与下地方政府决策回应的分析模型	(67)
第一节	理论假设	(67)
第二节	变量设计	(70)
一	网民参与指数	(71)
二	政府回应指数	(73)
三	政府与网民互动指数	(74)
第三节	参与—回应模型	(75)
第四节	四种模式比较	(79)
一	鸵鸟模式：网民参与、政府不予回应	(80)
二	杜鹃模式：民意先发、政府被动回应	(83)
三	蜂王模式：政府主动、民意部分参与	(86)
四	鸳鸯模式：共同主导、政民高度互动	(89)
第三章	模型检验：网络参与下地方政府决策回应模型的	
实证检验	(100)
第一节	政府回应和网民参与的关系	(100)
第二节	数据说明和模型假设	(102)
一	数据说明	(102)
二	模型假设	(103)
第三节	政府回应指数的模型实证分析	(103)
一	政府回应指数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103)
二	政府回应的回归分析	(107)
三	政府回应指数的时间序列分析	(111)
第四节	网民参与指数的模型实证分析	(123)
一	网民参与指数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123)
二	网民参与的回归分析	(125)
三	网民参与指数的时间序列分析	(128)
四	补充和小结	(138)
第五节	理论提升	(144)
一	研究发现	(144)

二 讨论	(146)
三 局限及未来研究	(147)
第四章 聚类分析：网络参与下地方政府决策回应模式的社会网络分析	(149)
第一节 鸵鸟模式	(152)
一 内涵特征	(152)
二 作用机理	(153)
三 产生根源	(155)
四 现实困境	(158)
第二节 杜鹃模式——《穹顶之下》案例的社会网络分析	(159)
一 内涵特征	(159)
二 作用机理	(159)
三 产生根源	(172)
四 现实困境	(173)
第三节 蜂王模式——漳州PX项目案例的社会网络分析	(173)
一 内涵特征	(173)
二 作用机理	(174)
三 产生根源	(186)
四 现实困境	(187)
第四节 鸳鸯模式	(189)
一 内涵特征	(189)
二 作用机理	(189)
三 理想路径	(189)
第五章 经验借鉴：网络参与下的地方政府决策回应典型经验与模式分析	(194)
第一节 网络参与下中国的地方政府决策回应的典型经验	(194)
一 地级市政府决策回应的典型经验	(194)
二 县级政府决策回应的典型经验	(197)
三 当前中国的地方政府决策回应经验存在的主要问题	(200)
第二节 世界主要国家的地方政府决策回应模式	(204)
一 自治型治理模式	(204)
二 共管型治理模式	(207)

三 管制型治理模式	(210)
第三节 启示与借鉴	(212)
一 政府与其他部门的协同治理	(213)
二 协调监管与服务功能	(215)
三 大数据与数字治理	(216)
第六章 制度创新：网络参与下地方政府决策回应的对策研究 ..	(219)
第一节 提升地方政府决策有效性与治理效能的对策建议	(221)
一 网络治理——网络参与下的决策民主制度建构	(222)
二 建立开放性的政策制定网络系统，建设参与回应型 政府	(223)
三 完善网络立法，规范网络参与秩序	(224)
四 改革政府决策机制，提高政治参与的成本收益率	(225)
五 改善沟通，增强政府与网民间的信任与互动	(226)
六 权力共享，政府治理与基层民主的有机结合	(227)
第二节 网络参与下地方政府决策回应的治理创新	(227)
一 治理理念的创新	(227)
二 治理角色的创新	(229)
三 治理方式的创新	(232)
第三节 结论与展望	(233)
参考文献	(238)
后记 直通网络善治的社会机制	(252)

导 论

弱关系有没有优势

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转化了人们生活的社会图景。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技术革命，正在加速重造社会的物质基础。^①

——曼纽尔·卡斯特 (Manuel Castells)

在网络时代，弱关系有没有可能突破传统社会网络强关系纽带的约束，在两个团体间的信息沟通中发挥出其强大的优势呢？如果有，怎样实现？

信息通信技术 (ICT) 的发展，使得公共管理和地方政府治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对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重新进行了塑造，特别是网络参与已经成为公民参与地方政府决策和治理的有效路径。地方政府决策中的公民参与正在经历从传统的政治参与向网络参与的发展与转型。

本书是在以下背景中展开研究的：中共中央提出“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与“加强网络社会管理，推进网络依法规范有序运行”的战略决策，地方政府决策面临信息化、网络化与社会转型、互联网迅速发展、公民网络参政的现实要求，国家处于“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转型时代。

近年来，有关中国地方政府治理的研究，在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上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尤其在有关地方政府决策与政府行为的研究方面，涌现了大量相关的研究成果。仅以地方政府决策研究领域中有政府与公民之间互动关系这一主题为例，大量研究关注地方政府在对公民偏好做出回应时采取的各种行为和策略。有学者认为，中国地方各级政府与公民互动的

^① M. Castells,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Volume I: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Blackwell, Oxford, 1996.

模式日趋多样化，公民的意见表达渠道日益便捷^①；但另有学者则认为，网络时代地方政府回应中具有价值、技术、制度和能力四方面的紧张性^②；在中国，公民网络参政行为的失序日益呈扩大的趋势，彰显了制度对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回应不足，表明公民、团体和国家之间关系的制度缺失和规范化的失败。^③有学者整合上述两种观点，认为在压力型体制和社会压力的双重压力下，地方政府回应社会压力的方式发生了逐渐从权宜之计走向行政吸纳的变化。^④在有关地方政府决策行为这一主题上，近年来社会科学界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分析概念，如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变通行为^⑤，政策执行阻滞^⑥，关门模式的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模式^⑦，等等。

在网络参与这一全新背景下，地方政府决策回应的行为和策略就更加复杂。一方面，虽然人们通常认为网络参与能促进政府决策的有效性^⑧，但也有反对观点：有的认为技术本身是效力不足的（ineffectiveness）^⑨，

① 朱光磊：《滞后与超越：中国地方政治发展总体观》，《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② 李放、韩志明：《政府回应中的紧张性及其解析——以网络公共事件为视角的分析》，《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③ 傅慧芳：《公民网络参政需求的增长与制度回应的博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④ 王清：《从权宜之计到行政吸纳：地方政府回应社会方式的转型》，《中国行政管理》2015年第6期。

⑤ 孙立平、郭于华：《“软硬兼施”：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华北B镇收粮的个案研究》，《清华社会学评论》2000年特辑。

⑥ 丁煌：《我国现阶段政策执行阻滞及其防治对策的制度分析》，《政治学研究》2002年第1期。

⑦ 王绍光：《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⑧ Vicente Pina, Lourdes Torres & Sonia Royo, “Are ICTs Improving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in The EU Region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An Empirical Study”,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 85, No. 2, 2007. Lourdes Torres, Vicente Pina & Basilio Acerete, “E-Governance Developments in European Union Cities: Reshaping Government’s Relationship with Citizens”,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 Administration, and Institutions*, Vol. 19, No. 2, 2006. Yueping Zheng, “Explaining Citizens’ E-Participation Usage: Functionality of E-Participation Applications”,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online 30 June, 2015, DOI: 10.1177/0095399715593313.

⑨ M. Lüders A., Følstad & E. Waldal, “Expectations and Experiences With My Labour Party: From Right to Know to Right to Participate?”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Vol. 19, No. 3, 2014. doi: 10.1111/jcc4.12047.

有的则认为网络参与对民主更为有害,因为受到压力的政府会变得更好使用这些技术来打压持不同政见者^①。

当然,学者们多数认为网络参与是一把双刃剑,对地方政府决策既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也有消极影响。比如塔坦荷夫(Tatenhove)等^②、詹姆斯(James)^③、埃里克松(Eriksson)^④等都认为有效的网络参与是提升治理效能和决策民主化的关键因素;巴伯萨(Barbosa)等^⑤更是认为作为一个网络化的工具,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使用,推动了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向未来模式转型。

对此,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就有关弱关系优势(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⑥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打通这两难选择与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法。他将人际关系的强度划分为强关系、弱关系和无关系,并且明确指出连接两个群体间的“桥”(bridge)一定是弱关系。由于弱关系是在社会经济特征不同的群体之间发生的,其分布范围较广,所以它比强关系更能充当跨越群体界限,从而获取并为群体带来原本不属于它们的信息与资源的桥梁。所以说弱关系通过桥的机制,在信息扩散上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是两个团体间信息通畅的关键,所以体现出其强大的优势,这对于网络参与和地方政府决策回应来说非常有研究价值的。

我们的理论分析始于这样一个观察,即网络时代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如何有效吸纳公众意见、实现决策者与公民的良性互动,是考验各级政府的决策能力与决策智慧的大问题。

① Clay Shirky, “Political Power of Social Media—Technology, the Public Sphere, and Political Change”, *Foreign Affairs*, No. 90, 2001.

② Jan Tatenhove, Jurian Edelenbos & Pieter-Jan Klok, “Power and Interactive Policy-Maki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ower and Influence in 8 Interactive Projects in The Netherlands”,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 88, No. 3, 2010.

③ Oliver James, “Managing Citizens’ Expectations of Public Service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Observation and Expectation in Local Government”,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 89, No. 4, 2011.

④ Kai Eriksson, “Self-Service Society: Participative Politics and New Forms of Governance”,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 90, No. 3, 2012.

⑤ Alexandre Barbosa, Marlei Pozzebon & Eduardo Diniz, “Rethinking E-Government Performance Assessment from A Citizen Perspective”,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 91, No. 3, 2013.

⑥ M. S. Granovetter,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78, No. 6, 1973.

虽然政府决策行为是贯串中国政府研究领域的一个主题，但在我们所阅读的大量文献中，很难找到清晰的分析框架，有解释力的概念、理论或者模型。此外，实际生活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在网络参与背景下，许多原本可为民众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公共决策，却出现了席卷全国、影响巨大的抗议和冲突。

随着政府运作过程的“黑箱”被逐步打开，这一领域中理论贫困的状况日益凸显出来。学者们很难找到合适的理论思路和分析概念来解读政府微观行为和过程机制。^①虽然有不少关于网络参与和政府回应关系方面的研究^②，但是这些理论观点大多着眼于两者间关系的规范层面，对于解释地方政府回应行为缺乏直接的实证价值。比如一些通论性研究中，如李大芳等提出了公众网络参与与政府回应演化博弈^③，朱丽峰提出了构建政府与网民良性互动机制的构想^④，但大多数情况下是自上而下的行政监督和自下而上的社会压力，共同构成了中国地方政府对公民诉求的回应力源泉。^⑤此外，有关网络参与和政府回应方式的研究中，不论是特定领域政府决策对网络参与的一般回应方式^⑥或模式^⑦，还是区分出政府主导性双向模式和公民主导性双向模式这两种模式^⑧，都不足以解释网络参与下地方政府的实际回应模式，如果只引入大而化之的抽象概念或理论比喻泛泛而谈，就缺乏足够的分析力度。由此可见，现有研究中有关网络参与背景下政府回应过程和机制的研究明显不足。

① 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2期。

② 张淑华：《网络民意与公共决策：权利和权力的对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1页。

③ 李大芳、白庆虎、陈志成：《公众网络参与与政府回应演化博弈分析》，《统计与决策》2010年第21期。

④ 朱丽峰：《论网络民意与政府回应》，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0年。

⑤ J. Chen, J. Pan & Y. Xu, "Sources of Authoritarian Responsiveness: A Field Experiment in China", Working paper, 2015, available at: http://www.princeton.edu/~jjdong/online_exper.pdf.

⑥ Steven J. Ball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Policymaki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76, No. 21, 2012.

⑦ 陈姣娥、王国华：《网络时代政策议程设置机制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1期。

⑧ 王法硕：《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2年。

因此，对于中国而言，探讨在网络参与这一全新环境下，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回应有何形态特征、作用机理和回应效果就显得非常重要。我们如何解释这些不同的、相互矛盾甚至冲突的图景呢？

鉴于此一系列有待回答的问题，本书从有关参与和回应互动的视角，提出一个有关中国网络参与下的地方政府回应典型模式的理论框架，据此解读中国地方政府主要治理模式及其相应的政府回应行为类型。我们将采取新的研究路径和方法、根据新的经验材料来分析，着重推进如下几点：一是在网络参与这一全新环境下，地方政府决策回应的过程是怎样的？二是地方政府决策回应过程中，政府部门和网民间互动的主要模式是什么？有何形态特征和作用机理？三是为何会形成这种地方政府回应模式？回应效果如何？在此基础上，我们希望描绘出中国地方政府治理的基本图景并试图建构解释模型，以此在理论层面深化现有中国地方政府治理研究和地方政府回应行为研究，并在经验层面回应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推进路径。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现状述评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网络参与下的地方政府决策回应机制是地方政府有效决策、提升治理效能的前提与基础。

一 网络参与和地方政府决策回应的条件依据

网络参与的技术条件、社会条件以及制度条件一起构成了网络参与和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条件依据。

网络参与是近年来崛起的一种新兴的公民参与政治生活，表达政治意愿的方式，它以互联网为载体，公民通过网络途径表达自己的诉求来影响或者改变政府公共决策和公共事务，同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政府提升公信力。互联网为公民的社会活动参与提供一个更加宽广的虚拟平台，并且表达方式也变得更加灵活。社会热点事件往往能够引起各方面的极大关注，而公民在网络上发表有关事件的言论和看法对于政府了解事态走向和公民意愿具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也能够加强政府和公民之间的互动交

流。从当前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公民网络参与和政府的决策回应离不开技术、社会以及制度三个方面的条件保障。

（一）技术条件

网络参与离不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成熟。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政府首次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计划，该计划一经提出即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信息风暴，在之后的几十年间，信息技术高速发展，深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而互联网技术作为信息技术的核心，其发展方向一直是重中之重。

互联网技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美苏冷战时期，虽然互联网的诞生仅仅是出于一种不满情绪。^①当时，美国国防部请其智囊团之一的兰德公司研究一个课题：通信系统能否经受住核打击的考验，并设计出一个保证通信系统畅通的方案。1964年，兰德公司项目主持人保罗·巴兰（Paul Baran）公布了研究成果《论分散式通信网络》，其网络是分散式网络，要求信息高度冗余，以取代中央控制式网络。与此同时，时任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简称ARPA）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主任的鲍勃·泰勒（Bob Taylor）则因自己办公室的三台电脑终端不能相互连通带来的苦恼而启动专门研究项目，聘请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家拉里·罗伯茨（Larry Roberts）参与研究计算机网络。和巴兰一样，罗伯茨的网络也是分散式网络，设定了一个形似蜘蛛网的构型。研究结果也表明，只有如此分散的网络才能发展成为如今遍布世界的互联网。

在此基础上，1969年，美国国防部下属的高级研究计划署资助建立了一个名为ARPANET的网络（即“阿帕网”），这个网络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斯坦福大学以及犹他州立大学的计算机主机连接起来，这就是互联网的雏形。到1971年，阿帕网的节点数量增至15个，到1972年，阿帕网的网点数已经有40个，这些网点彼此之间既可以发送小文本文件，又可以利用文件传输协议发送大文本文件。^②

从那以后，互联网的发展真正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美国国防部也开始

^① [美] 威廉姆·戴维德：《过度互联：互联网的奇迹与威胁》，李利军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48页。

^② [美]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4页。